

论科学研究“部分·描绘实在”之特质： 兼谈“戏仿”式科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孔令昊¹，吴海朝²

- 1).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 2). 吉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长春 130118

摘要： 科学哲学研究长期存在“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建构论”之争。文章讨论科学研究“部分·描绘实在”的基本特征，回应由相关争论所引发的问题，探究“戏仿”式科学研究的可能路径。相较于“霸权”式的“现代”科学，更具包容性的“戏仿”式“非现代”科学强调一种“参与性”与“行动力”，在当今时代能可避免“现代”科学的苏格拉底式困境，从而成为赫尔墨斯式的信息转译者，构想一种新“科学—社会”共同体的可能秩序。

关键词： 科学研究；“部分·描绘实在”；“非全性”；“戏仿”

Abstract: There has long been a debate betwee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 i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amely “mero-graph reality”, responds to questions raised by related debates, and explores possible paths for “Parody”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ared with “hegemonic” “Modern” Science, the more inclusive “Parody” “Non-modern” sciences emphasize “participation” and “action”, which can avoid the Socratic dilemma of “Modern” Science in today’s era, thus becoming a Hermetic information translator and envisioning a possible order of a new “science-society” community.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mero-graph reality”; “non-all”; parody

Received: January 13, 2026
Revised: January 30, 2026
Accepted: January 31,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5,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建构论”之争

在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话语中，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¹是客观理性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科学的真理性与人类活动无关，科学研究应当寻求一种“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1]这一说法事实上也更加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科学活动所生产的知识是脱离研究者的主观意志的，是具有“实在性”的，这一立场或可被视作“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实验室民族志则深刻揭示了“‘自然’借助‘人’的干预而予以呈现”的过程。以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为代表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长期关注“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简称SSK）领域，他们业已论述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建构过程。[2]此外，“科学技术社会论”（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对“科学”（sciences）的民族志描述动摇了西方现代性的根基。虽然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法国“巴黎学派”并不完全赞同布鲁尔将科学视作社会建构结果的主张，但他与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也通过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的隐喻，指出科学秩序的建构论面相。科学与利益已然密不可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也是科学与资本结合的过程。[3]更有甚者，美国哲学家约瑟夫·罗斯（Joseph Rouse）吸收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研究，揭示出科学实践空间内部的权力特质，认为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地方性知识。[4]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科学理解应当是“非—事实性”（non-factive）的，[5]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更加偏向于“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科学哲学主张。上述学者对于科学活动的认识视角与相关立场或可被归纳为“科学建构论”（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

这种对于科学哲学路径的划分方式借鉴自拉图尔《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一书中的相关讨论。“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建构论”在书中被分别表述为“内在主义”（*internalist*）与“外在主义”（*externalist*）。“内在主义”倾向于只处理科学思想的内部发展，而忽视外在的“社会”因素。“外在主义”倾向于用纯“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问题，而忽视其内部的文脉。事实上，这种区分方式仍然过于本质主义。^[6]“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建构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拉图尔

¹ 事实上，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含义不同于英语、法语中的“科学”：任何研究领域（包括人文社科）只要遵循系统的研究程序，就可以被认为是“科学”的。参考：（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穆赫吉著：《全球史学史（第二版）》，杨豫、（美）王晴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7页。笔者所使用的“科学”概念专指“自然科学”，因此更贴近于英语、法语中“科学”一词的含义。

寻求一种融合“科学建构论”与“科学实在论”的道路，在他的“科学论”²中，科学既具有“实在论”的一面，又有“建构论”的一面，因而是“建构主义实在论”（Realistic Constructivism）的。^[7]这种折中的处理方式恰恰映射了 STS 在理解科学活动时的居间性：在“词”与“物”之间反复调整自身位置的“半符号学”立场^[8]。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下问题：无论是传统人文社科自身，抑或是“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科学技术”的 SSK 与 STS，都始终无法避免一种被我们称为“元·反身性”（meta-reflexivity）的问题。以 SSK 为例，“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观点，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换言之，某个“SSK 文本”与观察该文本的“元·SSK 文本”，以及与进一步观察“元·‘SSK 文本’”的“元·元·‘SSK 文本’”无限重叠，^[8]形成了一种“俄罗斯套娃”（Matryoshka doll）式的“语言自我无限繁殖”之空间，“用‘话语’来研究‘话语’”使得相关研究在逻辑上陷入了一种“无穷倒退”“语义反复”的困境。如果 p 使得 q 发生，r 又使得 p 发生，等等，那就必须有一个“终极因”（finality）来结束“等等”。但人文社科文本（Text）被视为精心构筑的“人造物”（artifact）和一个永远无法被最终固定到单一中心、本质或意义上的“无限能指游戏”，因此宣称自己为某文本所有意义之起源的“终极因”是难以被接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文社科研究走向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谓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系谱学”（Genealogy）研究路径，即“群现”（Entstehungsherd）取代了“起源”（Ursprung）^[9]。

人文社科研究对于“无限能指游戏”的青睐，无疑受到了上世纪的符号学思想的影响。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中，一个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即“语言的符号”）与“所指”（signified，即“语言所指涉的概念”）组合而成，其并未涉及实在对象。^[10]符号不必与实在对应，因而具有恣意性。而在 STS 领域则显得更加复杂一些，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学派对于“物”的关注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作为‘分类系统’一部分的‘物’到不一定依赖于‘符号系统’的‘物’的转变”。^[8]STS 这种徘徊于“词”与“物”之间的立场使得具有恣意性的“符号”与部分脱离“符号系统”的“实在”之间的碰撞关系走向一个不断构建横向关联、愈发复杂且扑朔迷离的境地。或许，“科学建构论”与“建构主义实在论”正是在这种境地中对“科学实在论”进行攻讦，并由此成就其自身。

² 据拉图尔所说，“科学论”感兴趣的是“如何才能通过连续的形变，将世界渐进地融入话语之中，从而产生一个稳定的双向指称流”。参考：（法）布鲁诺·拉图尔著：《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史晨、刘兆晖、刘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25—126页。

笔者认为,不妨以“自然”(Nature/natures)为例讨论上述问题。布鲁诺·拉图尔指出,“虽然我们建构自然,自然却仿佛像是我们未曾建构过它似的”。^[1]这句话中所涵盖的“自然”概念其实可以做一种多元化的解读。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客观实在”的“单一自然”(Nature),不受个人主观意志所支配的“无我之物”,这或可被视作是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立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将不同人群所掌握的知识视作对于“单一自然”的“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与之相似的还有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自然主义”立场。在他的理论中,物质特性始终被置于首要地位,远远超过了其对语言的思考,但同时又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紧密联系,后来的 STS 无疑也受到了塞尔的影响。与此相对的,则是“康德主义”(Kantianism)传统下的“自然”观念,这一观念不将“自然”视作一种实在,而只是将其视作一种“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作为实在的“自然”(“物自体”[Thing in itself],即“自在之物”)实际上是不可知的,研究者所能触及的仅仅只是“现象”(phenomenon),这一哲学传统被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归入“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12]的范畴。深受该哲学传统影响的 SSK 学派,将科学知识视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如大卫·布鲁尔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两种不同“自然观”的分歧引向了两条不同的路径:STS(尤其是 ANT 学派)从“自然”(实在)本身的视角来审视(想象),认为“研究对象与观察者相互合作,使得自己的面貌得以呈现”;SSK 则从观察者(人)的角度来思考,认为“科学知识通过一系列活动从模糊逐渐走向了清晰,从而形成一种名为‘自然’的集体表征”。这也就使得 STS 与 SSK 之间以及二者的内部出现了复杂的话语对立。³但与此同时,虽然都源自一种“自然主义”立场,但 STS 学派的相关话语也与现代科学话语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断裂:在 ANT 中,“人”(human)与“非人”(non-human)将自身折叠进对方的内部,从而打破了现代科学话语赖以生存的“自然 vs 社会·文化”二元对立认识框架。所以正如本段开头拉图尔所述,“虽然我们建构自然,自然却仿佛像是我们未曾建构过它似的”,融合了“科学实在论”与“科学建构论”的“建构主义实在论”由此而来。

由此不难发现,不仅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对于“自然”的认识存在着“知识型”(épistémè)断裂,⁴即使在人文社科以及跨学科的 SSK 与 STS 内

³ 例如,虽然塞尔的思想是 STS(尤其是 ANT 学派)的理论基础,但二者对于“词”与“物”的偏好则有所不同,塞尔所讨厌的“符号学”,却正是拉图尔所擅长并热衷的。

⁴ 这一概念取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书,这部著作以符号学思想为基础,讨论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型”变化。本书的英文版、德文版书名都是“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Die Ordnung der Dinge),这是福柯本来想要使用的书名。尽管涉及了“物”这一主题,但福柯聚焦的更多是语言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而并非自然科学。所谓“知识型”指的是:特定时代的知识话语得以形成的规则。在这个规则的作

部，对于相同的概念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相关讨论依然无法避免一种被福岛真人称为“不知怎么地就转向了（ナントカ論の転回[turn]）”^[8]的过程。有关人文社科“元·反身性”问题的讨论，看似与本部分主题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只有以人文社科的相关特征为参照，我们方能更加直观的感受科学活动的基本特质。笔者将科学论文与人文社科的文本予以并置（juxtaposition），并由此发现：上述由符号学所引发的“无限能指游戏”与“元·反身性”问题似乎不曾出现在科学研究之中。我们如果综合考虑物理、化学等诸多自然科学的历史，便可发现福柯所谓的“知识型”断裂并未发生在上述领域。^[8]这是否能够说明科学研究从“话语游戏”中逃逸了？科学论文如何避免符号的恣意性？怎样理解科学活动的“实在性”？科学活动所生产的知识是否就是对“物自体”属性的客观揭示？笔者拟通过对科学研究“部分·描绘实在”之特质的讨论，回应上述问题，并揭示一种“戏仿”（parody）式“非现代”（Non-modern）科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2. 科学研究的“部分·描绘实在”

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scientia”，意思是“知识、认识、专业知识”，其最初概念可能是“区分”与“切割”，源自原始印欧语词根“*skei-”，意为“切割、分裂”。^{[13][14]}科学的发展史可以被简化为一种“切割”的历史，笔者将从以下两个层面予以阐释：（1）将“科学”与“非科学”相切割；（2）将“自然”与“社会·文化”相切割。

切割“科学”与“非科学”的重要标准是“可重复性”。科学实践通过“流动指称”（circulating reference）⁵的方式进行一系列规范化的形变与转译，改变和限制众人无法长久控制的言语行为，保持科学进程本身的可逆性，也就使得科学活动所生产的知识可以通过重复试验来予以检验。科学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经过严格标准化的语言，不像人文社科的“日常的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前文提及的“符号失控”的“元·反身性”问题。也就是说，科学论文相对而言是标准的、规范的、

用下，某一特定时代的“对象”也由此被重构为另一个时代的“其他对象”。参考：（法）米歇尔·福柯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⁵ 在康德的透视法中，现象存在于不可触及的物自体与活跃的自我所做的分类工作之间的交汇点；在流动指称中，现象是通过一连串的形变而经常性地流动的东西。科学家口中的真理不来自对社会、惯例、转义、联系的突破，而是来自流动指称所提供的安全性。流动指称通过大量的形变与转译，改变和限制众人无法长久控制的言语行为。参考：（法）布鲁诺·拉图尔著：《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史晨、刘兆晖、刘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98页、第129页。

⁶ 这种语言往往是私人化的，赋有各种隐喻性的技巧，不如自然科学的语言那般严谨，因而“转义”（tropic）现象似乎很难避免。“转义”是一种言语对其本义或字面义的偏离，是一种修辞行为。相关讨论见：（美）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北京：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页。

透明的，能够最大程度削弱人们对于“文本”（Text）的感知。“文本”更多是“情境”（Context）的，这恰恰是人文社科论文的特征。

根据拉图尔的说法，诸多被构造的科学知识争夺实在性，从而获得科学真理的地位。换句话说，科学知识由实验制造而来，它牵涉到一系列“非人”（仪器、研究对象）行动者。这种科学知识的“视角”是物质的、公众化的，因而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被理解、被重复的（或者说是可逆的），而保证自然科学知识生产之“视角”的可逆性的基础则是数学。用塞尔的话来说，数学语言是没有杂讯（bruit）的，数学方法让自然科学形成了逻辑严密的体系。数学的计算超越了事物本身的节奏，从而让自然科学能够借此对未来进行预测与规划。

此外，梅亚苏对于“前先祖”（ancestrality）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思想能够在不通过主体性行为的情况下进入“实在”（reality），而其所依靠的符号媒介正是数学话语。梅亚苏指出，“一切能够以数学用语公式化表述的关于客体的属性，都可以被理解为客体自身（作为物自体之客体）的属性”。^[12]这种关于第一性的描述承认了数学的独特存在论地位，第一性质作为可数学化的属性为自然科学奠基。“前先祖”描述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之前，甚至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形态出现之前的一切现实。^[12]由于科学活动对于“原化石”（archifossile）的研究，“前先祖”的历史被数学与科学话语揭示出来。从未参与人类及生命历史之生成的事物，能够被人类用数学话语进行描述，这意味着数学具有独特的独立描述之功能，用数学话语思考“前先祖性”就是在思考“不给定也能始终存在”的绝对之物。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一切声称能够接近某种普遍的绝对的思想是“思辨的”（spéculative），一切声称能够接近某种绝对存在物或者通过充足理由律接近某种绝对存在物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métaphysique），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是“思辨的”，但所有“思辨的”都是“形而上学的”吗？^[12]假设答案是肯定的，则数学被传统形而上学吞噬，从而成为“上帝信仰”（“终极因”信仰）的一部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构想一种不是绝对主义的绝对思考，即：将一种东西进行微量的绝对化，但要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绝对之物。梅亚苏选择将事实性本身绝对化。也就是说，事物存在恰恰是因为没有理由，而其他的可能则不一定不存在。这样，我们能够揭示科学知识的非相关样态，^[12]但又并未重启理由律（理由律会倒退回形而上学）。但我们同样能够发现，这恰恰从侧面说明了科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揭示客观实在。由于“可被量化的全体性”是无法被思考的，这导致了“归结‘频率/概率’”操作的失败，从而预示着必然论的失效。由此，梅亚苏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每一种数学式陈述未必都为真，但都绝对可能。^[12]换言之，尽管世界的稳定性是绝对的，但我们无法从中推导出世界的必然性。我们对

于世界的理解必然是“非全”的，而追求“可度量性”的“现代”科学，其研究过程中必然有“非可度量”的成分。

科学活动将“自然”与“社会·文化”相切割的做法，正是延续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康德（Immanuel Kant）以来的将“内在心灵”与“外在物自体”截然分离的认识论（即一种“心物二元论”）。在“哥白尼式革命”（Copernicus revolution）的口号下，世界被还原为无法接近的物自体。“康德发明了这一科幻小说式的梦魇：外在世界围绕着缸中之心灵旋转，后者规定了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定律，这些定律不需要任何其他帮助，便都能从其自身提取。这样，一个跛脚的暴君掌控了实在的世界”。^{[7][15][16]}但在 STS 与 SSK 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特定科学概念的产生、修改与消亡，永远无法通过对“物自体”本身特性的简单分析来确定，这种概念的变迁涉及到各方面的力量。科学争论并不完全是所谓“客观真理”的问题，它同样牵涉到一系列“人”（同行、科学教育者、公众等）与“非人”（仪器、实验室等）的行动者。以科学的概念元素（联系或结，links or knots）为中心，它需要动员至少四种范畴：仪器与场点（如实验室、博物馆等）、自治化（专业的同行与学科建制的历史）、联盟（如议会、教育部、实业家等）与公共表征（如新奇的社会化客体、民众、记者等）。^[7]如果我们不采用“回溯时间性”的思路去回顾科学活动，而是遵循科学研究本身的逻辑去审视科学知识获得“实在”地位的过程，我们能够发现：公众对于某一“实在”的判定，在争论解决之前是不可知的。换言之，所谓“科学实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涌现的偶然事件相互作用所得出的结果。科学活动对于所谓“实在”的揭示，既是发现，也是发明。

尽管科学研究凭借数学话语能够直接思考“实在”，但其所构建的知识仍然是不确定的。作为“绝对整体”的“自然”是不可思的，科学活动必须将其进行“切割”，以便后续的实验操作与相关研究。科学研究借助“人”的力量使“自然”予以呈现，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并非完全摆脱了“人为”的因素，与其说是“自然”呈现了自己原来的面貌，不如说是“人”与“非人”共同参与了“自然”之特质的生成与呈现。因此，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始终不是完全发现“自然”，而只是借助各种“人”或“非人”的因素来辅助自己解码“现象”，以期获得一种对于“作为‘整体’之‘自然’”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用数学话语编码“自然”，而数学自身独有的思辨性则引领我们的科学活动去思考一种“可在”（may-be，一种真实且密集的可能性）。这种“可在”是我们对所有可能“存在”的想象。“存在”是“纯多”（multiple pur），但作为“纯多”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可思的。一切思想都以可思之物的某一“情势”（situation，也可以被称作“多元”[multiplicité]）为前提，即一种“计数为一”（compte pour un, count-as-one）

的操作。^[17]以集合论为基础的“数学存在论”关注“‘纯多’如何被整合、计算为‘一’”，这种计算必然是非全的，它不承诺提供一种“总体”的“一”作为基础。既然“纯多”是存在论层面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预设一个完全确定的、具有超越性的“总体”并以此来认识“多”，而应该在“纯多”的无限生成中想象并计算一个动态的、“非全”的“总体”。正是因为科学研究所能计算的“总体”总是“非全”且动态的，所以我们永远只能在“可在”中描绘有限的“存在”，并宣布这些有限的“存在”为“实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所有可能的存在”视作“实在 1”（Reality），则科学研究所能描绘的永远只能是作为“实在 1”的一部分的“实在 2”（reality）。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研究是在“部分·描绘实在”（mero-graph reality）。

3. “非现代”科学走向何方？——“戏仿”式科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既然科学研究是“部分·描绘实在性”与“非全”的，我们完全可以启动一种“非现代”（Non-modern）科学。“非现代”科学研究鼓励人类在“超混沌”（hyperchaos）中进行思考，拥抱“偶然性”与“非可度量性”。所谓的“超混沌”与“混沌”有极大的差别。“超混沌”所蕴含的“偶然性”比“混沌”更加的激进，因此可以被视作“超偶然性”（super-contingency）。如果说“混沌”的“偶然性”意味着事物的永恒生成，那么“超混沌”的“偶然性”（或者说是“超偶然”）则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被摧毁，即：“超混沌”的“偶然性”不再指代“无秩序的必然性”，而是指“秩序与反秩序”“生成与永恒”之平等的偶然性。^[18]这种极致的“偶然性”反对必然的给定，从而与传统“形而上学”决裂。事实上，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人文学中的“尼采—福柯—德勒兹”哲学传统下的“系谱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目标。尽管梅亚苏将人文学中的上述传统视作“生成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becoming，在这一传统中还有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18]但二者的冲突其实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不可调和。关于这点，容笔者另撰文讨论，本文不做赘述。

“系谱学”绝不承认“同一性”的暴政，因而确保了“差异”的正当性。正是不惮于成为“视角性”的知识，“系谱学”嘲笑了“客观”“价值无涉”的庄严，而称自己的研究方法为“戏仿”（parody）。这个极具戏谑风格的词汇，道出了人类知识的奥秘。在笔者看来，“范式”（paradigm）与“戏仿”具有某种亲缘性。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定义，“范式”指的是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按既定的用法，一个范式

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式或模式。^[19]而“戏仿”（parody）与“范式”（paradigm）拥有同一个词源：希腊语前缀“para-”（在旁边，平行）。^{[20][21]}某种程度上而言，人类知识范式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模仿行为，在“宇宙”（universe）的“超混沌”中企图以此来建构秩序。虽然库恩与 SSK/STS 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路径上的分歧，但笔者的“戏仿”意图调和二者，既通过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部分肯定“内在主义”的“科学实在论”（即：强调库恩“范式”说的合理性），使得“科学建构论”不至于消解科学知识的特殊性，同时又承认 SSK/STS 的“外在主义”认识。换言之，科学研究具有一种“两仪性”特质：既可以被对称化（相较于人文学而言不再具有霸权性），又保留了自身特殊性（具有非相关样态）。

尽管科学研究相较于人文社科研究而言，能够凭借数学话语与相对规范的科学论文限制“符号失控”以获得某种“可逆性”，并使自身获得思考“绝对之物”的特质。但我们通过前文的讨论亦不难发现，科学研究的“部分·描绘实在”之特质恰恰暗示：作为“词”的科学话语总是不能完全把握作为“物”的“实在 1”，其所生产的“实在 2”始终是暂时的、历史的，具有可变性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成的复杂科学话语体系，无疑具有“符号失控”的隐患，因为转译活动总是伴随着某一种符号体系对另一种符号体系的误读（尽管科学家努力限制该问题，但误读情况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在诸如全球变暖、环境危机等跨学科研究中，许多概念的含义在不同学科体系中具有差异性，这些不同文脉间的差异性为“反身性”思考提供了土壤。此外，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是相当模糊的，许多学科兼具科学性与非科学性（如果我们将“科学性”定义为“可重复性”），“科学划界”工作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真理的多元性：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是一直变化的，界定真理边界之实践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笔者可以举出三个案例来说明上述问题：

（1）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a L'age Classique*）一书中讨论了“疯狂”与“理性”的界限随历史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复杂过程。

（2）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 2012 年率先发起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品开发计划”（*patient-focused drug development*）使得“患者参与药品研发”的设想逐步走向实践。

（3）近期在《*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表明，人的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在大脑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编码方式，这是以往神经科学研究所忽视的。

通过第一个案例，我们能够发现：科学真理的认定标准随着时代的不同可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同时代的人对于“疯狂”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而后面两个案例则说明了科学真理的认定工作同样也离不开非科学家群体的参与，普通民众可以参与到药物研发的过程之中，而神经科学的研究同样离不开人文社科研究者的介入（例如：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离不开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这些被以往的科学工作者们刻板的认为“缺乏科学素养”的人群，如今却要参与到严肃的科学研究活动之中，真是一种“黑色幽默”（Black Humor）！这无异于印证了笔者在前文的判断：一个特定科学概念的产生、修改与消亡，永远无法通过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简单确定，科学真理的认定涉及到各方面的力量。

这需要我们摆脱一种庸俗的“实在论”立场，而去拥抱一种“工具主义”的可能性。“实在论”认为，一个理论模型应当尽可能的与“物自体”的运动节奏相贴合。但在“工具主义”看来，一个好的理论模型应当是能够引起一系列后续的思考，至于极力证明这个理论模型是否正确的做法，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当然不否认科学研究需要“求真”，但基于“实在论”的“求真”与基于“工具主义”的“有效性”追求应当是并行不悖的。“有效性”是通往“真”的台阶，对于科学活动之“有效性”的追求，并不会妨碍我们“求真”，反而更有利于我们去着手解决实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自己对“真”的认知^[5]。

“戏仿”式科学研究所要强调的恰恰是一种“参与性”与“行动力”：既然人类知识始终是对一种“可在”的模仿，那科学活动便无所谓“追求‘绝对真实’”，这要求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参与到与世间万物的互动中，在拥抱“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重思“自我”与“世界”。“自然”作为“捣蛋鬼”（Trickster），经常以一种不可预知的面貌呈现在科学家面前。“戏仿”式科学研究为了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奇”（Surprise），必须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既然“自然”是不可预测的，则科学家们不太可能事先就准备好完全的对策。这需要科学研究在高度数学化的基础上，采用实验室民族志的办法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下实验的每一个细节，让“视角”充分物质化与公众化，同时关注在“可度量性”的“尺度”下所隐藏的“非可度量性”（nonscalability）成分，对相关研究之智识基础进行反思，并通过数学话语寻找新的、“可在”的理论架构，以便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对于“超物体”（hyperobjects）⁷的思考与研究。

⁷ 这一概念源自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在莫顿看来，“超物体”指的是相对于人类而言，在时空量级上有着巨大分布的物，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黑洞、油田、生物圈、太阳系、龙卷风、海啸，甚至化学元素、苯乙烯泡沫塑料、种族、阶级或资本主义轰鸣的机器等都是“超物体”的化身。时空无限性是“超物体”最为显著的性质，这意味着人类无法对其进行完全掌握，而只能求助于统计等手段。参考：Timothy Mort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尤其是在面对当今环境危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时，“戏仿”式的“非现代”科学（sciences）能够展现出比“霸权”式的“现代”科学（Science）更多的包容性，因为它从不惮于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并以开放的心态同人文社科协同合作。拉图尔对于柏拉图（Plato）《高尔吉亚篇》（Γοργίας）的解读业已指出：作为“怨恨者”（men of resentment）的苏格拉底（Socrates）将雅典民众从他们基本的社会性、道德、技能中剥离出来，将他们描绘成孩子、猛兽和被宠坏的奴隶，于是愤怒的雅典民众迫使苏格拉底服毒自杀，因为他不属于公众的一部分。^[7]“现代”科学家面临的正是苏格拉底式的处境，而“非现代”科学家则选择直面这一问题，力图通过“戏仿”式科学研究摆脱这一处境，从而提出一种“共生产”（co-production）的行动纲领：从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模糊的边界地带寻找促成多方合作的契机，并构想一种新“科学—社会”共同体的可能秩序。可以说，“非现代”科学家不希望自己成为“苏格拉底”，他们希望成为“赫尔墨斯”（Hermes），作为传递信息的使者将一方的话语“转译”（translation）给另一方

参考文献

- [1](英)卡尔·波普尔,著.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2](英)大卫·布鲁尔,著.知识和社会意象[M].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3](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M].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 [4](美)约瑟夫·劳斯,著.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5]赵聪妹.科学理解是事实性的还是非—事实性的? [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5(1).
- [6]Steven Yearley. “Reviewed Work(s): Pandora’s Hope: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by Bruno Latour and Pandora Christie”[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2 (1).
- [7](法)布鲁诺·拉图尔,著.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M].史晨,刘兆晖,刘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
- [8]福島真人.言葉とモノ— STS の基礎理論[A].藤垣裕子,等,編.科学技術社会論の挑戦(第三卷)[C].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
- [9]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A]. in D. F. Bouchard edited.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0]Annemarie. Mol, Jessica. Mesman. “Neonatal Fo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Some Questions of Method”[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96 (2).
- [11](法)布鲁诺·拉图,著.我们从未现代过[M].余晓岚,林文源,许全义,合译.中国台北:群学,2012.
- [12](法)甘丹·梅亚苏,著.有限性之后:论偶然的必然性[M].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 [13]“scienc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EB/OL]. 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science#etymonline_v_22918. accessed November 26, 2024.
- [14]“*skei-”.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EB/OL]. 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skei-. accessed November 26, 2024.
- [15](法)勒内·笛卡尔,著.论方法:第一哲学沉思[M].张小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 [16](德)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7](法)阿兰·巴迪欧,著.存在与事件[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18]Quentin Meillassoux. *Time Without Becoming*[M]. edited by Anna Longo. Mediolan: Mimesis International, 2014.
- [19](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知识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parody”.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B/OL]. [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 parody# etymonline_v_7235](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parody#etymonline_v_7235). accessed August 13, 2024.

[21]“paradigm”.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B/OL]. [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 paradigm#etymonline_v_7167](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paradigm#etymonline_v_7167). accessed August 13, 2024.